

DOI: 10.19832/j.cnki.0559-8095.2020.0002

主持人语(陈锋): 研究历史, 离不开理论与方法, 史学理论与方法一直是史学界关注的问题。这一期笔谈缘于在武汉大学的一次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讲座, 于沛等先生即是讲座的主讲者。《史学集刊》的编辑孙久龙先生学思敏锐, 在讲座过程中即要求我组稿, 得到诸位先生的允诺。于沛先生曾长期主编《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 是研究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著名专家, 其他参与笔谈的作者, 虽然术有专攻, 但并不是史学理论与方法的“道”中人。从一定意义上说, 这期笔谈是“业内”“业外”的组合。也或许由于这种组合, 带来一些新的气象, 不至于流于“空泛”。于沛先生在世界整体史观的视野下, 谈论“中国世界史学术体系的核心理论”, 值得认真研读。事实上, 这一论题不仅仅是世界史学科的问题, 我在 20 多年前的一篇习作《马克思主义整体世界史观与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曾经指出“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论, 整体世界史观不仅对重新审视世界历史有重要意义, 对相关领域的研究也同样富于启迪”。赫治清先生重提“唯物史观是史学研究基本理论和方法”, 是基于自己的研究实践, 有相当的说服力和借鉴意义。倪玉平教授的大作以及笔者的小文, 也同样是基于研究实践的思考。希望对读者有所助益, 当然也希望得到读者的品评意见。

整体史观: 中国世界史学术体系的核心理论

于沛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101)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呼唤着新史学, 构建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学术体系提上日程。所谓“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学术体系”, 即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 通过原创性和批判性的研究实践, 逐渐形成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关注人类的世界史理论框架。其目的是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认识纷繁复杂的人类历史, 科学阐释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获取历史的启迪和智慧, 以更清醒地把握现实、开创未来。

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世界史研究得到迅速发展, 成果斐然, 其主要原因是唯物史观在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广泛传播, 越来越多的世界史学者, 自觉地坚持用唯物史观研究人类的全部历史。1962 年,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3 卷 4 册,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强调: 这部书从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出发, “力图通过东方和西方各国的历史事件、人物和制度, 阐明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和基本规律。在分期叙述世界史总进程的同时, 也分别揭示某些国家本身历史发展的线索; 并论述各时期中国与各国的关系”。^①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第一部综合性的世界历史著

收稿日期: 2019-10-12

作者简介: 于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暨史学史; 赫治清,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清史、中国秘密结社史、中国灾害史; 陈锋, 武汉大学珞珈杰出学者特聘教授,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财政史、经济史、明清史; 倪玉平,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史。

^①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前言》, 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

作,体现了中国学者当时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和研究水平。

继1962年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后,又陆续有多部世界史问世。这些著作虽体例不一,各有特色,但又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用唯物史观重新研究人类的全部历史时,自觉地关注中国世界史学术体系的构建。这主要体现在世界史研究关注现实,要“运用正确的理论和方法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进行全局的而非割裂的、唯物主义的而非唯心主义的考察”。^①改革开放的中国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为构建中国世界史学术体系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广阔空间。

1992-1994年,吴于廑、齐世荣主编6卷本《世界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又相继出版了齐世荣总主编的4卷本《世界史》。和1962年的《世界通史》相比,这两部世界史著作不仅内容更丰富,视野更开阔,而且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唯物史观受到严峻挑战提出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社会形态问题、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等,都旗帜鲜明地作了回答。1859年1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②这些在上述两种《世界史》中,都有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从理论到实践的深入的阐释。

2010年,武寅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世界历史》8卷39册,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编写者在该书的《总序》中指出“本书是世纪之交,当代中国世界史学者对世界历史的独立理解,并提出一种崭新的、有中国特点的认识世界历史的体系。生活在当代的历史学家,如果不能把历史‘溶化’在当代之中,那就不可能理解历史,写出历史感与时代感相结合的历史”《世界历史》“不回避当代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使世界史研究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中国史是世界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与世界’将在本书中独立成卷,重点探讨中国与世界文明的碰撞、交融及互动”。^③上述都不是随心所欲的空泛议论,而都是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展开。“论从史出”的结论令人信服。中国世界史研究硕果累累,为构建中国世界史学术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世界史学术体系,不仅是逻辑和历史实证的统一,而且也是批判与建构的统一。建构中国世界史学术体系,首先要清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人类历史的歪曲,用唯物史观阐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彻底摒弃宣扬种族主义的“欧洲中心论”,深入批判并清除其在中国世界史研究中根深蒂固的影响。

18世纪中期,德国哥丁根学派的一些史学家最早提出了宣扬种族优越的“欧洲中心论”,后经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史学家兰克推波助澜,成为19世纪殖民主义史学的核心理念,长期在西方史学据统治地位。黑格尔极力突出西欧和日耳曼民族的“至高等级”,将世界民族分为“世界历史民族”和“非世界历史民族”。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虽然始于东方,但东方和中国“缺乏对自由的认识”,所以不是世界历史民族。在他看来,中国文明犹如“空气”,是静止的和没有深度的;而西方文明则是“火”,火在对立统一中超越自身,不断完满。他还认为,“地中海是世界历史的中心……没有地中海,世界历史便无从设想了”。^④极力宣扬“欧洲中心论”。

“欧洲中心论”用西欧的历史,随意剪裁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历史。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已有一些学者如张闻天、雷海宗等,对“欧洲中心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⑤1949年9月,中国历史学家周谷城著《世界通史》3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著作完全摒弃了“欧洲中心论”的谬说,强调世

① 吴于廑《世界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第1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④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31-132页。

⑤ 参见张闻天《〈西洋史大纲〉译序》(1925年1月,《张闻天早期文集》(修订版),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488-491页;雷海宗《评汉译韦尔斯著〈世界史纲〉》,《时事新报》,1928年3月4日。

界史应该是关于世界整体的历史，应该具有世界性，而非以欧洲为中心。作者通过对尼罗河流域文化区、西亚文化区、爱琴文化区、中国文化区、印度文化区、中美洲文化区 6 大古文化区的深入阐述，努力凸显不同文明的特征，及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强调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是世界史的重要内容之一。周谷城著《世界通史》既是鸦片战争前后到 20 世纪中叶，百余年来中国世界史编纂的总结；又是在新中国诞生前夜，迎接中国世界史研究高潮到来的新的标识。

1964 年，吴于廑在批判“欧洲中心论”把世界分成“文明的欧洲和落后的非欧洲”，用欧洲的价值观念衡量世界时，开始提出“整体史观”思想。他说“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史，无疑必须体现世界的观点。所谓世界观点，是针对地区或种族的观点而言的。它应当排除地区或种族观点的偏见，全面而如实地考察世界各地、各国家、民族的历史。但是直到现在，一部完好的、真正用世界观点写成的世界史，似乎还不曾出现”。他认为以往见到世界史家的共同局限，“在于缺乏一个世界史家所必须具备的世界观点”。^① 文章发表后不久，“文革”开始，中国历史科学遭受严重摧残，世界史研究受到破坏，吴于廑的研究被迫停顿。

“文革”后的 1978 年 6 月，吴于廑在教育部召开的“全国高校文科教学工作座谈会”上，再次重申了他的“整体史观”思想。他认为撰写新的、有特色的世界史，“必须树立以世界为一全局的观点”，“在世界史这门学科中，有不少重要的超出地区史、国别史范围的专门课题，有待我们研究。不研究这样的课题，我看就难以从全局来考察世界历史”。^② 1985 年，吴于廑在其主编的《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的《前言》中，解释了为什么要以 15、16 世纪作为研究的主题。他认为 15、16 两个世纪所发生的变化，对从全局考察世界历史，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两个世纪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基于农本经济的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互相闭塞的状况，开始出现了有决定意义的突破。分散隔绝的世界，逐渐变成了联系为一体的世界。人类‘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③ 此后，吴于廑等又相继主编了《初学集》的“续编”和“三编”，^④ 对 15、16 世纪东西方历史进行了更全面的研究。

构建中国世界史学术体系，要自觉坚持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但这并不排除在此前提之下，在研究实践中逐渐形成其学术上的核心理论，并随着社会发展和科学进步而与时俱进。任何一门学科的学术体系，都有自己的核心理论，中国世界史的学术体系也如是。那种认为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就是“追踪”“介绍”外国史学，没有自己的学术体系，更没有什么核心理论，这纯属无知或偏见。中国世界史学术体系的核心理论，是吴于廑提出的“整体世界历史观”（整体史观）。它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在世界历史认识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其理论渊源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形成的。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虽然是哲学历史观的概念，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以及《历史学笔记》《古代社会史笔记》中，都可看出其内容和唯物史观的阐发密切结合在一起。马克思坚持历史和逻辑结合两种方法的有机统一，得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⑤ 的经典结论。他还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⑥ 人的解放的程度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是一致的。马克思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也为中国世界史“整体史观”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① 吴于廑《吴于廑文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4 页。

② 吴于廑《吴于廑文选》，第 19、20 页。

③ 吴于廑主编《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 页。

④ 吴于廑主编《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续编》，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薛国中、安长春主编《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三编》，湖南出版社 1993 年版。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48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87 页。

为深入阐述“整体史观”，吴于廑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就“整体史观”进行了艰苦的理论探索，一批重大学术成果相继问世。^① 199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出版，吴于廑为其撰写的卷首长篇导言《世界历史》，可视为“整体史观”的系统表述。其理论要点是：

——世界历史的内容，是“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②

——资本主义大工业和世界市场，消除了各民族、各国的孤立闭塞状态，日益在经济上把世界连成一个整体，从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都依赖于整个世界”。^③ 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史观，世界历史不是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或者按形态学派的说法各文明历史的堆积，而是其自身有规律发展的结果。

——“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纵向发展方面和横向发展方面”。“纵向发展”，指五种社会形态构成一个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纵向序列，但它并非是一个机械的程序。“不同民族、国家或地区在历史上的多样性，和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并非互不相容的矛盾”。“横向发展”，“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④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⑤

——前资本主义时期阶级社会农本经济，必然具有“闭塞性”，闭塞状态是普遍存在的。不打破普遍存在的闭塞状态，历史也就不能发展为世界历史。闭塞状态的打破，有待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交往的增多。社会经济水平是交往增多的决定性因素。

——两个多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以工业革命和现代科技的巨大动力，“实现了人类历史空前未有的纵向和横向发展……但在不断扩大和发展的同时，它面临着难以解救的矛盾”。这首先是资本主义内在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资本主义的衰亡和社会主义的扩大，将使世界历史的纵向和横向发展，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新的时代。社会主义“扩大以至最后遍及整个世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向。黄河九曲，终将流归沧海”。^⑥

“整体史观”是中国世界史学术体系的核心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对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有里程碑的开拓意义。先驱者的筚路蓝缕之功，后学者将永远铭记在心。中国世界史学术体系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其基本特点是鲜明的民族精神、强烈的时代感和厚重的历史感。70年前中国人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屹立于世界东方，为中国世界史学术体系的构建，开辟了广阔的现实道路。70年来，几代世界史学者无怨无悔，勤奋耕耘，世界史研究精品力作令世界瞩目，是世界史学术体系生长的丰腴土壤。中国世界史学术体系的构建，对中国人民从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满怀信心地走向未来，必将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① 这些成果主要有《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游牧民族》(《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历史上的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世界历史》1987年第2期)、《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世界历史》1993年第1期)等四篇相互关联的论文。

② 吴于廑《世界历史》，第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8页。

④ 吴于廑《世界历史》，第27、28、30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页。

⑥ 吴于廑《世界历史》，第105页。

唯物史观是史学研究基本理论和方法

赫治清

(中国社会科学院 古代史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新中国 70 年来, 史学研究的一系列伟大成就, 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指导下, 正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取得的。这里, 我想结合自己研究实践, 从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人民群众与杰出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理论方面, 谈谈唯物史观是史学研究基本理论和方法的体会。

一、社会形态理论有助于正确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 史学界曾就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再次展开讨论。这次讨论和建国初期大讨论一样, 分歧依旧, 有的甚至声称明清时期并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在我看来, 这涉及要不要和怎样运用唯物史观和方法论, 特别是社会形态理论问题。唯物史观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依据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 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大致可以划分为五种社会形态。每一个社会形态都是人类社会历史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同一种社会形态发展过程, 又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中国封建社会在其初期、中期、后期, 社会经济形态也经历了一个不成熟、不完善到逐步完善成熟的过程, 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发展演变过程。明中叶以后, 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 或是流通、交换与分配关系, 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租佃关系、雇佣关系, 都出现了诸多变化。马克思还特别强调人在社会形态中的地位, 提出经济关系当事人的概念 “生产方式的主要当事人, 资本家和雇佣工人, 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 人格化, 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 是这些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① 有的学者主张, 在考察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清时代, 是否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时, 应该抓住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② 是十分正确的。

其实, 所谓资本主义萌芽, 有其特定内涵, 它指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 随着商品经济发展, 城市繁荣, 在生产经营领域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初级形态并处于萌芽状态, 而非其他;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于明中后期, 大致可以上溯到 16 世纪的嘉靖、万历年间; 这种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 一直在缓慢成长。尽管一度受明清易代的破坏性影响, 但随着清政权向中原文化的成功转型、按照中国传统模式进行社会重建, 国家治理的有效推进, 资本主义萌芽重现生机, 尤其在“康乾盛世”的极盛时期, 增长势头有所增强, 一直持续至 19 世纪中叶。清代资本主义萌芽, 不仅仅局限于城市中的手工业行列, 而且, 在农村的农业中也已经出现。战国秦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间, 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一直以其固有的特殊机制稳健运行, 尽管发展缓慢, 但并不等于静止、停滞。明中叶以后, 尤其在清代, 封建经济结构里还萌发了资本主义的新因素。中国封建社会仍然是沿着客观经济规律向前演进的。“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的发展, 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 如果没有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649 - 650 页。

^② 江太新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二三事》,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3 年第 3 期。

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① 把中国封建社会看成一潭死水，是“超稳定性结构”，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之所以未能茁壮成长起来，并发展为完整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近代转型，主要因为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打断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正常进程。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有助于正确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二、运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理论， 开创探讨天地会起源新路径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曾对天地会做过专题研究。天地会是清代著名秘密结社，有关起源问题，众说纷纭，迄无定论。1934年，罗尔纲先生在《水浒传与天地会》一文中，^② 曾把大清律中歃血结盟条款作为天地会起于康熙年间的旁证。80年代，“乾隆说”学者则对此大加诘难，认为不足以说明问题。其实，“乾隆说”的反驳乏力，并未击中要害，更没有发现罗先生引用的大清律条款，在康熙年间现行例里并不存在。尽管如此，我仍以为罗先生把相关禁律条文作为天地会起源旁证的思路具有开创性，自己深受启发。

清朝开国之初，在“详译明律，参以国制”的基础上，制定的第一部完整的成文法典《大清律集解附例》，本无禁止歃血结盟条款。但刑部却定有“凡异姓人结拜弟兄者鞭一百”的条款。顺治十八年(1661)，又进一步规定“凡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者，著即正法。”^③ 康熙帝即位后，为加强国家治理，多次增修律例。康熙三年(1664)新例载“凡异姓人结拜弟兄者杖一百，如十人以上，歃血盟誓、焚表结拜，为首者杖百、徒三年。余各杖一百。相应入律。”三月十二日奉旨“歃血盟誓、焚表结拜者殊为可恶！此等之人，著即正法。”^④ 康熙七年(1668)复准，“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应正法者，改为秋后处决。其止结拜弟兄，无歃血焚表等事者，仍照例鞭一百。”^⑤ 八年(1669)，刑部新颁律例，把上述规定作为赌博的附录列在“杂犯”类中。^⑥ 十年(1671)，清朝刑部增订的律例，把它从“杂犯”移出至“谋叛”类“歃血结拜弟兄者，不分人之多寡，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秋后处决；为从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其止结拜弟兄，无歃血焚表等事者，为首杖一百、徒三年，为从者杖一百。十二年题准，凡异姓人结拜弟兄，未曾歃血焚表者，为首杖一百，为从杖八十。”^⑦ 十八年(1679)，刑部奉旨编进《现行则例》。二十八年(1689)将其附入《大清律》，并于每篇正文之后加上总注、疏解律义，于四十六年(1707)辑成，但未正式刊行。

雍正帝即位后，续修《大清律集解附例》，五年(1727)刊行全国。歃血结盟条款，正式列入《大清律集解》卷一八《刑律·贼盗》之“谋叛”类中。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和《大清律例根原》，将该款误判为雍正三年(1725)所定，以致多年来一些学者据以为歃血订盟条款正式列入《大清律》“谋叛”类始见于雍正朝《大清律集解》，进而认定歃血订盟作为谋叛政治罪，始于雍正初年，与历史事实有出入。^⑧

乾隆朝对雍正《大清律集解》继续修订，并于五年完成，定名《大清律例》，简称《大清律》，禁止歃血结盟条款，列于第23卷《贼盗·谋叛》中，条文和雍正朝所订内容基本相同。清朝司法，实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页。

② 罗尔纲《水浒传与天地会》，《大公报》，1934年11月26日《史地周刊》。

③ 雍正《大清会典》卷一九四《刑部·奸徒结盟》。

④ 康熙八年题定《新颁律例》卷一《康熙三年新例》。按：我于1982年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发现此书。

⑤ 雍正《大清会典》卷一九四《刑部·奸徒结盟》。

⑥ 康熙八年题定《新颁律例》卷二《康熙八年新例》，第85-86页。

⑦ 雍正《大清会典》卷一九四《刑部·奸徒结盟》。

⑧ 参见赫治清《论天地会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第五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9-272页。

际以律例为准,条文经常改订增添,自乾隆十一年(1746)起,形成制度,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其中,涉及禁止歃血结盟条款,乾隆朝有三次重大增修。第一次乾隆二十九年(1764),首次将“结会树党”与“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联系在一起写进大清律。第二次乾隆三十九年(1774),针对广东地方“不序年齿”,聚众结拜,多达四五十人,增订新例。罗先生上述误引的条文,正是这次修订的内容。第三次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严惩复兴天地会的规定。

历史表明,天地会和歃血结盟的政治活动一脉相承。由于天地会活动极其秘密,清政府长时间没有发现其名目,因而往往把它和歃血结盟活动看成一回事。即使乾隆五十一年(1786)台湾林爽文天地会起事后,《大清律》已有严惩天地会条款,清政府在处理许多天地会案件时,仍援引《大清律例》中所谓“凡异姓人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之类“谋叛”条款或“闽省民人结会树党,阴作记认”的规定“量刑定罪”。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生活是社会存在的唯一现实基础,历史进程中一切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哲学的和思想文化等观念,都深深植根于社会物质生产的基础上。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是社会存在经济基础的集中反映。每个时代的法律、条令、条例,都反映那个时代统治阶级的需要。清朝刑律禁止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和复兴天地会的有关规定,就是清代社会的集中反映。异姓结拜弟兄,既然在清初没有当作政治谋叛,那么,这类活动就如同赌博一样禁而不止,并从中获得可乘之机。随着大规模的抗清斗争结束,清朝在全国最终确立“治统”,国内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公开的武装抗清被非武装的秘密斗争所代替,“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这一适合秘密活动的聚众结社方式,也因此逐渐发展起来。与此同时,清政府在镇压各地反清活动中也终于发现在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的案件中隐藏着政治上的反清秘密结社。于是,康熙十年,清朝刑部增订律例时,断然将八年尚作赌博附录的“杂犯”类“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条款,改作“十恶不赦之罪”的“谋叛”未行律。这表明,在此前夕,这类活动有了迅速发展,清政府已多次查获这类案件,从而引起严重关切,并企图借助法律制度的威力和暴力手段来消灭其存在。清朝上层建筑发出的这一重大信号表明,自称“反清复明”、以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为组织形态的天地会呼之欲出。而康熙十八年,刑部将异姓人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与无歃血盟誓事情的一般异姓结拜加以严格区别,并将它视为谋叛罪而纳入现行例中,以致被雍正初年修订的《大清律集解》照旧编入,则为天地会起于康熙年间提供了有力旁证。我深深感到,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理论,开拓了我的眼界,为解开天地会起源之谜提供了一把钥匙,为探讨天地会起源问题,开创了一条新途径。

三、秉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理论,书写清代中国制造,弘扬工匠精神

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之一,是当今历史研究必须遵循的又一重要原则。我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工作15年间深有体会。作为《清史》重要组成部分的传记,既有皇帝、王公大臣、军事将领等政治人物传记,也有学术、文苑、宗教、少数民族、科技、工商、遗民、农民领袖、革命党人、华侨、外籍人士和循吏、孝义、忠烈等传记,既有男性,又有女性。皇帝传主要记述他一生用人行政的重大决策,关乎国家安危、国计民生、历史进程的大事,着重勾画其施政轨迹,反映其时代特征。基于清代每个皇帝的经历、即位背景、在位形势、执政理念、大政方针、策略手段、成就业绩、行为方式、处事风格、情感性格等等不尽相同特点,要求突出个性,切忌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千人一面。显然,《清史·传记》,绝非像旧史学为帝王将相树碑立传的翻版,而是严格地同唯心史观划清了界限。2008年,清史编委会主任戴逸教授在传记组启动13个类传项目5年后,提出增设诸艺类传,包括武术、棋艺、曲艺、笔墨、制砚、雕刻、泥塑、陶瓷、刺绣、竹编、髹漆、建筑营造等等传统手工艺及带有工艺特色的老字号创始人、重要传承人传记。他们大多是来自清代社会下层的特殊群体。旧史书基本上不给这类人物立传。他们的事迹,在官书、文

集、笔记、方志中都难得一见。即使供职内廷的皇家工匠，在出版的《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中偶有涉及，也是见首不见尾，且卷帙浩繁，有如大海捞针，在史料搜集上存在很大困难。故实施三年后，远未达到预期效果，尤其是涉及手工工艺人物传记。我作为直接分管这个项目的责任人，感到十分棘手。是否继续坚持下去，或者取消，传记组内也一度犹豫。我反复考虑，觉得难度大是事实，但它毕竟是新修《清史》的创新项目。传主及其传承的手工艺或技艺，不仅大多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而且这些工匠、武林棋坛高手，巧夺天工的技艺，恪尽职业操守，崇尚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值得弘扬。做好这个项目，不但有其重要学术价值，很可能成为新修清史的一大亮点。而且，对于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承传中华文明，推动我国文化事业和产业的发展，为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做出新贡献，更具积极的现实意义。我便主张坚持继续做下去，并毅然接下亲自承担整改重写的重任。回顾这段历史，我和传记组同仁，秉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理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为书写清代中国制造，弘扬工匠精神，做出应有努力，感到无比自豪。

唯物史观在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同时，并不否认杰出人物和领袖在历史上的作用。上述13个类传项目的设计和实施，正是这种历史观的具体体现。像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及其颇有作为的臣僚，在国家治理，推进财政经济改革，促进中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实现国家大一统局面的最终形成所做的贡献，都值得肯定。当然，历史人物能够做出多大的贡献、能够给当代和后世留下多少值得长久怀念的东西，归根到底，取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回应了时代的需要。人们批评乾隆皇帝未能处理好对外开放关系，甚至指责他“闭关锁国”，错失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千载难逢良机。乾隆皇帝在对外交往中确有失误，但并非“闭关锁国”或“闭关自守”，我在多年前就认为，乾隆皇帝在国家安全和对外开放的两难选择中，更多地选择了前者，以致执行了“闭关自守”政策。历史反思，总结经验教训是必要的。但不要忘记，唯物史观总是认为，任何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都无法超出历史时代加予他们的限制。

技艺·学理：“史无定法”与专门史的融合研究

陈 锋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史无定法”作为史学研究方法论的高度概括，影响巨大。学界一般认为，“史无定法”是吴承明先生的观点，事实上在其他学者笔下，或许已多有提及，如余英时在1991年写就的《怎样读中国书》中就已经说“我以前提出过‘史无定法’的观念”。^①所以吴承明在集中论述“史无定法”的重要文章《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缕述了这一观点的发轫。“1984年，我在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中国经济史国际讨论会上说：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就历史研究来说，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我以为，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作出选择，同一问题可用不同方法论证者，不妨并用，若结论相同，益增信心，若不同，可存疑”。这是吴先生提出“史无定法”的源头。在他1992年正式提出“史无定法”时，也曾经表明“我国早

^① 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14页。

有‘史无定法’之说。我赞成此说”^①并没有把这一提法归在自己名下。在缕述学术史时，这是需要首先明了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吴承明是最早系统论述“史无定法”的学者。有些学者在引述吴先生观点时，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误解或简单化倾向。林甘泉先生曾说“过去有一个说法，史无定法，意思是研究历史不能拘守于一种方法。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稍微再作一点补充，说历史研究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博采各种史学方法，这样就更全面一些。”^②王学典称“吴承明认为，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作出选择。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经济计量学的方法、发展经济学的方法、区域经济史的方法，乃至系统论的方法，都在选择之列。……这就是所谓‘史无定法’的基本含义。祛除了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理论，特别是所有经济学理论的意识形态属性，把所有这些理论都还原为从事历史分析的具体工具，从而为大规模引进和使用西方社会科学通则洞开方便之门，这可能就是‘史无定法’论所将起到的革命和解放作用。历史学将有可能从此走在没有意识形态重负的学术之路上。”^③方志远则专门论述过“史有定法”和“史无定法”，他说“史有定法和史无定法又应该是统一的，历史研究既要恪守本门功夫又要博采众长。当需要进行数据统计时，就必须用计量学或统计学的方法；当需要进行实地考察时，就必须用人类学或考古学的方法。‘史无定法’强调的是历史研究不排斥任何学科的有效方法，根据研究的需要，可以采用一切有效的方法，并不断地将其改造为历史研究的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早已成为中国内地学者研究历史的‘本门功夫’或‘定法’，应该说是成功的例证。相对而言，‘史无定法’表现的是历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包容性和创新性，‘史有定法’强调的则是历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的独立性和稳定性”。^④林甘泉、王学典、方志远都是著名的历史学者，他们的观点当然值得参考和重视。

笔者认为，在吴承明先生笔下，“史无定法”至少包涵了三点要义：第一，“史无定法”在把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同时，明确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没有将其等同于一般的方法，更没有“祛除”其意识形态属性。事实上，吴承明将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世界观、历史观的思维方法，第二个层次是归纳、演绎等求证方法，第三个层次是经济学、社会学等的分析方法。吴承明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具有指导意义的第一个层次，他说“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世界观，包括一系列的理论、原则和规律”。又说“我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应是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世界观层次的指导方法，也是检验其他层次的方法的工具。”^⑤为了避免误解，他还专门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话作为论据“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⑥这应该是颇有用心。在另外一篇他认为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续篇”的文章中也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最高层次的指导”。^⑦第二，“史无定法”已经包括了“史有定法”。这个定法，就是历史学之所以称之为历史学的史料和考证之学。即吴先生所说的“史料是史学的根本。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证，论从史出，这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从方法论说，治史必须从治史料始，则是道出根本。不治史料径谈历史者，非史学家”。“考据学是我国传统史学方法的瑰宝”，而“求证和推理一类的方法，包括我国史料学和考据学方法”，虽然基本上不发生世界

① 吴承明 《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

② 林甘泉 《历史研究的古今中外法》，《理论与史学》，2017年第3期。

③ 王学典 《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④ 方志远 《“定法”与“定论”：历史研究方法论二题》，《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⑤ 吴承明 《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6页。

⑦ 吴承明 《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

观的问题,但“新中国建立后,史料学和考据学都老树新花,空前繁茂。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大规模地、系统地整理出多种大型史料丛刊。新史料迭出,除考古学的发现数量空前外,以档案的利用最为突出。除国家档案外,进而开发地方档案、个人档案、企业档案、社团档案,档案研究成为专业。民间文书的发掘也蔚然成风。七十年代以来,碑刻和族谱的研究转盛。八十年代以来,开展有组织的古籍整理和全国性的修地方志工作,规模之大,动员之众,世所仅见。史料既丰,今人考据学的水平亦远超过前人”。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新中国史学的繁荣,才谈得上其他方法的运用。第三,“史无定法”的根本,是在于说明史学研究面对纷繁的历史现象,没有一种万能的方法可以应对,必须吸取各家之长。即使是作为传统史学方法瑰宝的考据学,从方法论上讲,也有其局限性,经济史研究尤其如此,因为“一切经济现象都是一个过程,有它的继承性和发展阶段性。经济史从来不当是事件史。考据学对于系统的过程研究似无能为力”。所以吴先生将可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除传统的史料学和考证学方法外,归为五项,即:经济计量学方法、发展经济学方法、区域经济史方法、社会学方法、系统论方法。^①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当然也还有其他方法。

应用于经济史研究的经济计量学方法、发展经济学方法、区域经济史方法、社会学方法、系统论方法,笔者在《中国经济史纲要·绪论》中已经有所阐述,^②这里只对经济计量学方法略作申论。经济计量学方法应用于经济史研究、历史研究,其功用是无可怀疑的。近年来,陈志武、马德斌、龙登高等人领衔的“量化历史讲习班”,已经连续举办了七届,据其招生简章称“特邀国内外一流学者授课,包括:曹树基(上海交通大学)、Sascha Becker(University of Warwick)、陈锋(武汉大学)、陈志武(香港大学)、龚启圣(James Kung,香港大学)、李楠(复旦大学)、龙登高(清华大学)、马驰骋(香港大学)、马德斌(Debin Ma,伦敦经济学院)、彭凯翔(河南大学)、James A. Robinson(University of Chicago)(按姓氏拼音排序)”,“目的在于为年青学者提供一个学习与交流平台,共同推动量化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广受学界欢迎,已经与华南学派连续举办的“历史人类学研讨班”齐名。中国经济史计量研究、量化历史研究成为新的研究热点。问题在于,一方面,“大多数中国经济史学者对于计量经济史持有一种将信将疑的态度,一些比较资深的学者则抱有排斥的情绪”;另一方面,“一些计量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在史料方面存在差错(有时甚至是严重的错误),研究缺乏充分的史料支撑,对所研究对象所处的整个历史环境了解不够(有时甚至是完全不了解)”。^③如有些学者对“北宋、明、清的GDP总量、经济结构、增长格局以及公共财政等问题”的研究,据说得出了“惊人”的研究成果,但其资料运用和研究方法,很难使人信服。这或多或少会增加历史学者的疑虑和影响计量历史研究的健康发展。^④

上述围绕着“史无定法”涉及的方法论展开,专门史的融合研究也是一种方法论,所以一并讨论。前者是一种具体的手段,后者是一种学理上的方法,或许可以把前者称作技艺上的方法论,后者称作学理上的方法论。

专门史作为某一门类的专门历史,大多是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如经济史与经济学、财政史与财政学、社会史与社会学、文化史与文化学等等。专门史研究的融合事实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某一专门史研究的融合,一是若干专门史研究的融合。

就某一专门史研究的融合而言,兹以笔者较为熟悉的经济史研究为例。由于经济史研究的交叉性质,经济史学者的出身、经历、学养不同,研究方法互异,在中国经济史学界已经有不同的流

① 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

② 参见陈锋、张建民主编《中国经济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8页。

③ 李伯重《反思“新经济史”研究:回顾、分析与展望》,《澳门理工学报》,2017年第1期。

④ 有关评述,可参见仲伟民、邱永志《数据估算与历史真实——中国史中GDP估算研究评述》,《史学月刊》,2014年第2期。

派,有的偏重于理论,有的偏重于实证,或者说,有的偏重于经济学,有的偏重于历史学,我已经把偏重于经济学、偏重于理论的称之为“理论经济史”学派,把偏重于历史学、偏重于实证的称之为“实证经济史”学派,并且分析了梁方仲(1908-1970)、汤象龙(1909-1998)、严中平(1909-1991)、李文治(1909-2000)、傅衣凌(1911-1988)、彭雨新(1912-1995)、李埏(1914-2008)、吴承明(1917-2011)、汪敬虞(1917-2012)的学术出身和学术研究。^①梁方仲、严中平、吴承明、汪敬虞出身于经济学,汤象龙、彭雨新出身于财政学,李文治、傅衣凌、李埏出身于历史学。出身经济学(包括财政学)的居多。他们事实上理论与实证兼具,并没有因为经济学、财政学的出身,而忽视经济史的实证研究,如果检视他们的论著,更多地具有宏阔的视野和实证研究的色彩。从本质上讲,经济史从属于历史学,“经济史的根据仍然是经过考证的史料,在经济史的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②其他专史——财政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等,也同样是一种历史研究,研究经济史或其他专史,必须遵循历史学的研究规律,遵循历史学的叙事风格,把史实缕述清楚是其初阶,实证、考辨是主要的手段,经济学或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处于从属的地位。所以治经济史者应该在历史学传统学养的基础上尽可能地研习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出身于经济学界的学者和出身于历史学界的学者在研究历史上的经济问题时体现各自的特色是理所当然的,但问题在于,历史学界的学者注重史实的罗列和考辨,一般不太注意经济理论与方法的运用,甚或缺乏经济学的基本素养,影响到经济史研究的理论归纳和宏观视野。经济学界的学者则大多不愿在史料的挖掘和考证史实上下功夫,人云亦云,以致错讹百出。反思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实践,继承老一辈经济史学家的优良传统尤其重要,即如我所归纳和呼吁的“李剑农、梁方仲、严中平、李文治、汤象龙、傅衣凌等是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在学养上,他们兼具历史学和经济学功底,在理论和方法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历史实证之学,论著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现在有些不同学术背景出身的经济史学者,在借鉴西学、宏观叙事、问题意识、讲求模式的倡导下,追求标新立异,出发点虽然值得肯定,但传统学养欠缺,粗制滥造或拾人牙慧的论著不在少数,需要高度注意。只有在很好地继承老一辈经济史学家优良学风的基础上,才能有真正的可以传世的创新性成果。”^③

在历史研究中,区分为经济史、财政史、社会史、文化史等若干专门史,是学科内细致化、专门化以及不同学科交叉的一种表现形式,有其积极意义。改革开放后,社会史、文化史、区域史等专史研究的“复兴”和异军突起,也被视作近几十年来史学研究繁荣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时至今日,各专门史之间已经形成了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局面。

就若干专门史研究的融合而言,笔者在前掲《与时代同行:中国经济史研究70年》中,从经济史研究的角度,指出“单一性的经济史研究或其他专史研究,已渐次被融合性、扩展性研究所代替”。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历史地理与经济史的融合、社会史与经济史的融合”,并列示了若干具体事例。^④在另外一篇文章《近四十年中国财政史研究的进展与反思》中,也已经论述了包伟民、刘志伟等人在研究宋代及明代财政史,笔者以及周育民、倪玉平等人在研究清代及近代财政史的时候,将财政问题与经济问题、社会问题融合研究的事例,以及财政——经济——社会的连锁反应,

① 陈锋 《“理论经济史”与“实证经济史”的开拓与发展——纪念吴承明、汪敬虞先生百年诞辰》,《中国经济史评论》,2017年第1期。

② 吴承明 《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③ 陈锋 《与时代同行:中国经济史研究70年》,《光明日报》,2019年11月18日。

④ 陈锋 《与时代同行:中国经济史研究70年》,《光明日报》,2019年11月18日。

即由财政到经济，由经济到社会的研究路径。^① 可以参阅。另外，像区域史的研究，本身就是探讨地域社会的全貌，必然涉及区域经济、区域社会、区域文化事项以及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诸多因素。像文化史的研究，在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地理环境、经济背景、工艺水平、思想学说、社会形态、政治制度等都起过至为重要的作用，也就要求对文化史进行地理的、经济的、社会的、制度的、思想的、宗教的、民俗的多视域综合研究和融合研究。一般意义上说，专、精、深，是专门史研究的三个要素，而专门史的丰富性、多样性以及彼此关联，又要求在专、精、深的基础上进行融合性的多面相研究。

比较经济史：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路径^{*}

倪玉平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北京 100084)

新中国建立以后，对中国经济史学以至整个中国史学界影响最为深远的变化，就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由于马克思主义重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经济史研究被纳入并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文革”前，中国大陆史学界的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上，尤其是有“五朵金花”之称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汉民族的形成等五个议题。古史分期的讨论，实际上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发展道路。农民战争的起因及其利益诉求，也是重在经济领域。封建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萌芽，更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和题中应有之意。这样看来，“五朵金花”中的四个议题都和中国经济史有直接的关系。由于问题意识集中，导致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史蓬勃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文革”中，中国经济史研究陷入停滞的状态。“文革”结束后，中国经济史迎来又一个高速发展时期。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中国的经济史研究也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这一时期，学界整理出版了大批的经济史文献档案资料，研究方法和理论迅速转向和走向多元化。与此同时，从事这一学科研究的专业人员之众多，出版和发表的学术论著数量之丰富，都是史无前例的。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史学术界，思想在解放，研究方法在更新，研究领域在扩大，研究水平在提高。当然，总体而言，中国的经济史研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尤其是需要进一步扩大研究领域，进行全方位国际对话与合作，以开拓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局面。

植根于中国理解世界，置身于世界研究中国，是中国经济史学人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经济史研究不能坐井观天、闭门造车、自说自话，研究的最终目标还是要进行国际比较。国际比较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比如目前经济史研究热点中的财政治理能力、物价工资、市场融合以及历史GDP研究，都是很好的国际比较素材。

以清代的财政史研究为例。西方学者很早就意识到中国的财政状况与国家官僚制度与地方治理有着密切关联，即政府行政能力的强弱主要表现在征集赋税、徭役的能力和效率方面，因而他们考

^① 陈锋 《近40年中国财政史研究的进展与反思》，《江汉论坛》，2019年第4期。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清代商税研究及其数据库建设(1644-1911)”(16ZDA129)和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资助项目“清代商税与社会变迁研究”(W05)的阶段性成果。

察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视角就是朝廷的财政状况及与此有关的政治、社会变动。马克斯·韦伯则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甚至提及国家权力“垄断”财政的概念。^①直到19世纪之前，中国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经济水平，一直稳居世界前列，正是这一国家治理模式的重要成就。清朝的国家治理模式是在继承中国历代王朝统治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全新的融会、贯通、创新和发展，适应了独特的国情和历史发展道路，较好地解决了当时的社会问题和民生问题，从而为“康乾盛世”的出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清代的国家治理能力，极大地推动了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治理能力的最高峰。直到西方工业革命之前，中国一直走在世界经济前列。

另一方面，清朝国家财政体系的转型发端于鸦片战争之前的嘉道年间，真正的近代转型发生于咸同时期，体现在中央与地方关系、财政收支结构和财政指导思想等多个层面；推动清代财政近代转型的动力首先是内生的，既受时局的重大影响，也是嘉道以来财政实践的自然结果，西方列强的影响反在其次。这种由农业型社会向近代化的工商业型社会转变步伐，虽然是被迫的，但却和17—19世纪世界范围内的财政转型，即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轨迹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前近代中国的财政体系与欧洲各国差异甚大，但清代财政体系的演进轨迹却绝非“西方中心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偏离于世界各国近代化转型的主流道路之外。这对于在全球史的视角下来比较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轨迹，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的财政结构虽然经历了以田赋为主体的农业型财政到以厘金和海关为主的工商业型财政，但目前已有的大多数成果都集中于探讨清代税收本身，尚较少从全球史的角度展开中西比较，以凸显清代税收长期变迁趋势的共性与特性。而目前的欧洲财税史研究，大多数成果也正好处于上述分析框架之下，一是探讨欧洲各国是如何以财税征收为契机推动本国财政结构和体系的近代转型，二是探讨欧洲各国以限制王权对财税的征收为起点引发革命并最终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可以说，财税是对清朝与欧洲近代早期进行比较的极佳对象。

吴承明先生曾说“历史本来是多样性的，多样之中有共同性的东西。前瞻性分析与回顾性分析相结合，可以避免先验论，符合历史多样性的本来面貌，取得比较客观的判断。”^②只有比较才能发现问题，找出问题和回答问题，并由此而得出全新的认识。笔者曾著文比较1823年清朝癸未大水与爱尔兰1816年大饥荒的财政投入及其路径依赖，指出清政府的赈济财政支出虽然比英国高出约15倍，比普鲁士高出约6倍，但加权人口因素后却可以发现，英国受灾民众所接受的人均补贴远超过清朝。考虑到至今普遍认为当时的英国过于“马尔萨斯化”，中国却是封建集权体制下的儒家伦理治国，两者的鲜明反差值得做进一步思考。^③

近些年来，随着计量史学、新经济史学的崛起，量化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与同时期的世界其他经济体进行比较的“历史GDP”研究，在国内外学术舞台上日渐兴起。国际学术界围绕这一研究潮流还引发了对诸如“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等问题广泛而持续的大讨论。尽管学者对GDP估值持有不同意见，但作为一项重要的综合指标，它不仅包含经济总量，也包含经济结构。通过GDP指标，一个国家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经济兴衰和结构变迁，基本上可以一览无余，在此基础上，更可以较为方便地进行纵向与横向比较研究。正是因为有了历史GDP研究的基础和共识，国内外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明清、近代中国社会是发展还是停滞的讨论，才有可能形成统一的标准和为大家所接受的结论；国际大分流的学术讨论，也才有了更为流畅的沟通平台。当然，由于多方原因，来自西方的GDP研究系统，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以“欧洲经验”和近代欧洲

① [德]马克斯·韦伯著，王容芬译《儒教与道教》，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4页。

② 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7页。

③ Yuping Ni, Martin Uebele, "Size and Structure of Disaster Relief when Stat Capacity is Limited: China's 1823 Flood", in *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59(Mar. 2019).

的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最重要乃至唯一的衡量标准。身为中国学者,我们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既不能完全排斥这套体系,也不能被它所局限,应把更多精力放在研究传统中国经济运行的结构、特点和规律上,并将其置于全球经济体系中,考察其发展及其与西方经济的相互关系,只有如此,“中国历史GDP估算及经济总量的国际比较研究,才能真正具有本土学者的特色,并以这种特色贡献于‘整体主义’的世界经济史研究,而不使研究成果成为新版本的‘欧洲中心观’的数量化诠释”。^①在这一研究潮流中,中国学者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相信通过踏实努力的工作,中国学者一定能够探索出一条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历史GDP研究道路,这也是中国学术走向国际的重要途径。

经济史比较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简单论证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优越性或者独特性,而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对照与反思,在客观恢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更加清晰地认识中国,理解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前,为反击黑格尔的“中国经济长期停滞”论及其变种理论,国内的清史学者主要从清代前期生产力发展水平、商品经济的发展、雇佣劳动的变化等方面展示清代经济发展的成就以及局限,认为与同时期的欧洲各国一样,17-19世纪的清代经济正缓慢地向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转型,突出表现为清代经济中已经孕育出了较为成熟的资本主义萌芽。此后,国内学者在反思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范式的基础上,突出清代经济中市场需求与专业化生产互动的特点,认为清代处于传统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早期阶段。因此清代经济发展属于由市场规模扩大、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生产带来的斯密型增长。斯密型增长的观点在国际上得到了加州学派的支持。尽管资本主义萌芽论、斯密型增长论理清了清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若干成就和趋势,但它毕竟是以欧洲小国的发展经验为参照系,未能揭示出清代中国经济发展自身的固有特征与长期影响。与欧洲小国相比,清代中国具有经济发展的三个优势条件,分别为丰富的自然资源、数量众多的人口资源和庞大市场规模。它们共同构成了清代中国特有的“规模优势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最大成就体现于国家经济总量的不断提高,但如果计算人均GDP,这个指标却不断在下降,说明清前期的规模优势型发展仍有很大局限。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国内外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制约中国发挥上述三种大国优势的障碍逐渐扫除,才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得以充分依托三种大国优势,实现了快速增长和赶超,其经济总量在近年也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

当然,比较经济史研究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既要注意比较对象的选择,又不能画地为牢,自缚手脚。即如当下的经济史研究中,我们既要注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比较,又要注意与同时期不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进行比较,从而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比如研究19世纪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除了要关注中西“大分流”,批判“西方中心观”,比照中国与英、荷等国发展道路的异同,也应该扩大视野,同样关注这一时期印度卧莫尔王朝、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以及南美洲各国的历史,考察其各自的发展脉络。即以印度为例,因其复杂的族群矛盾、宗教冲突、土邦林立与中央集权的严重缺失,再加上柴明达尔制度、札吉尔制度、包税制等独特制度,导致卧莫尔王朝一直难以完成大一统任务,并最终沿着军事扩张——财政危机——内乱——外敌入侵的道路演进,在葡萄牙、荷兰及英国东印度公司等殖民势力的轮番强行介入下,于19世纪中期彻底丧失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整个印巴次大陆最终沦为英帝国的殖民地。印度于19世纪下半期推行的畸形近代化事业及其民族解放运动,是在印度人民饱受政治凌辱、经济遭受宗主国压榨的特殊情况下艰难启动的。晚清时期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我们评判这一时期所推行的洋务运动、清末新政,乃至反思“全盘西化”等理论预设时,印度的经历无疑是绝佳的参照物。

责任编辑:孙久龙

^① 倪玉平等《中国历史时期经济总量估值研究——以GDP的测算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